

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

杜廼松 著

学术故宫

故宫出版社

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

杜迺松 著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 / 杜迺松著. —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34-0743-4

I. ① 古… II. ① 杜… III. ① 汉字—古文字学—文集 ② 青铜时代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 H121-53
② K87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9233 号

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

著 者: 杜迺松

责任编辑: 梅 婷

装帧设计: 王 梓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42.5

字 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743-4

定 价: 166.00元



杜迺松先生近照

杜迺松简介

杜迺松，1937年6月生，北京市人。著名学者，古文字与青铜器研究与鉴定大家。自幼受到有高等教育文化的父母影响，酷爱文史。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旋即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受到唐兰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培养。五十余载以历史考古理论和先秦两汉等古代文献为基础，研究内容广泛。作为一名学者型专家，主要从事青铜器、古文字和商周秦汉考古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研究主要涉及古文字研究考释、器物考证、考古学类型学、青铜器分期分区与断代、科技考古、文物美学、器物与金文鉴定等多维层面。注意史论结合，建立了青铜器与铭文完整的发展演变的理论体系，并取得了金文考释研究的多项成果。参加20世纪90年代国家组织的全国文物鉴定系统工程专家组，负责青铜器与铭文鉴定，在近十年的鉴定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果。

五十余年在海内外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三十余种著作（含独著、合著与主编），如：《中国青铜器发展史》、《大师说器：杜迺松说青铜器与铭文》、《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铜器》（上、下卷）、《中国青铜器收藏鉴赏全集》、《中国文物定级图典》（1~4卷）、《青铜器鉴定》等。其中《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一书获全国文博考古最佳文集奖，有的论文被收入《世界学术文库》。

作了大量的教学和学术演讲，同时承担了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社科院研究生院、全国文博系统和外国驻华使馆等讲授青铜器与古文字理论和鉴定课，堪称桃李满天下。

曾赴美、法、意、日、韩、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进行文化学术交流和演讲。多次受海内外媒体采访，先后作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大家》，香港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等栏目的嘉宾。现为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多所大学和文津讲坛兼职教授，中国保利艺术博物馆、中国收藏家协会顾问，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和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担任多种专业杂志，如《故宫博物院院刊》等杂志的编委或学术委员。1992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其业绩被收入《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世界名人录》等书，其书写的钟鼎文书法已列入名家系列。

目录

上编 古文字考释

全国铜器鉴定所见金文考察	(1)
青铜器铭文中的金属名称考释	(19)
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26)
金文的发现与先秦史研究	(46)
金文“容”字考释	(52)
古亚簋与寓鼎铭文考释	(57)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61)
邕其三卣铭文考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69)
克盂克盨铭文新释	(86)
史墙盘铭难字解释和周初史事	(93)
荣簋铭文考释及其意义	(97)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德”字	(103)
春秋吴国具铭青铜器汇释和相关问题	(113)
对“五年复吴”“君幸酒”“君幸食”的考释	(124)
读“三年相邦铍”铭文随笔	(128)
“巴蜀图语”中壘尊的解释	(131)
金文句鑕左守讨论	(135)
周原地域甲骨文与金文记研	(145)
简论青铜器铭文的几个问题	(154)

论商周金文中父祖宗亲辈分称谓	(164)
孙诒让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贡献	(176)

中编 青铜器研究

青铜器的分期与断代	(183)
论中国早期铜器中的若干问题	(209)
论夏代青铜器	(229)
论春秋战国青铜器的风格与特征	(236)
论先秦时代南方青铜器的风格与特征	(263)
论青铜文化中的青铜生活用器	(278)
论黔桂滇青铜器	(290)
谈江苏地区商周青铜器的风格与特征	(300)
论巴蜀青铜器	(309)
论东周燕国青铜器	(318)
东周时代齐、鲁青铜器探索	(329)
论中山国青铜器	(343)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青铜器综论	(354)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青铜器考察	(374)
论《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中的青铜器	(384)
古越阁藏商周青铜兵器考	(391)
论青铜鸟兽尊	(396)
青铜器定名的几个理论问题	(416)
从湖北崇阳出土的兽面纹铜鼓谈起	(424)
司母戊鼎年代问题新探	(429)
青铜钺的初步研究	(434)
论列鼎制度	(444)

青铜匕、勺、斗考辨	(453)
论东周诸侯国青铜器与铭文的风格特点比较	(464)
《故宫青铜器馆》图集总序	(474)

下编 青铜工艺与青铜器铭文鉴定

古代青铜器艺术论	(488)
谈近年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的新进展	(501)
战国铜镜初探	(509)
中国古代铜镜述略	(525)
论近年新出铜镜的意义	(533)
简论秦代青铜器铸造业	(542)
先秦两汉青铜铸造工艺研究	(548)
两汉时期青铜冶铸业与科技考古	(560)
赴豫鉴定青铜器综论	(576)
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	(590)
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	(599)
青铜器鉴定定级标准理论与实践	(623)
科技考古在青铜器研究中的意义	(639)
全国铜器鉴定所见伪器伪铭研究 ——兼论鉴定的几个理论问题	(643)
后 记	(669)

全国铜器鉴定所见金文考察

近年来，笔者有幸赴全国各地对国家各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的青铜器进行鉴定，见到多年来新发现的大量重要金文，并得以摩挲审视。

以下就其中历史价值较高的商周至两汉的金文，进行论述。

一

青铜器在中国起源很早，但何时始有铭文，这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商代前期（二里岗期）青铜器被文物考古界确认后，这一问题开始明朗起来。河南郑州白家庄二里岗期的二号墓，出土铜鬲的颈部有三个龟形图案^①。有学者指出，该图案就是“𪚩”字，是氏族徽号^②。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鬲，鬲上有一图文，该图文可认定为“亘”字^③。从目前所见资料看，以上图文应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铜器铭文。铭文多表现为图画文字，是代表某一家族族徽的一种特定符号。这些铭文在文字学上自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以安阳殷墟出土铜器为代表的殷商后期青铜器，不但铸造浑厚凝重，装饰精美，而且器上铭文也较普遍，有一字、二三字、十几字甚至几十字不等。一个字的多为族氏名，近年新出土的仅具族氏名的铜器颇多，重要的如：

① 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10 期。

② 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 年 7 期。

③ 石志廉：《商戊鬲》，《文物》1961 年 1 期。

1980年在豫南罗山县蟒张出土殷墟二期至四期的数量青铜器中,26件有“息”字铭^①,表明蟒张基地为息族基地,对研究淮河流域的商代族氏分布具有一定意义。1961年河南温县出土的商后期铜器,方鼎、爵、斚,铸有“𠂔”铭^②。1991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出土的商后期铜器有“又”和“戈”铭^③。1969年在山西石楼义牒出土的一件戈的内部后端,有一“𠂔”铭^④。山西灵石旌介村1985年发现的二号墓铜器上大多有“𠂔”铭徽记^⑤。1973年陕西省岐山贺家村出土的铜器,有的有“庚”、“山”、“𠂔”铭^⑥。1970年湖南宁乡黄村发现的铜卣有“戈”铭等。殷商后期的这些单名族徽的发现,有重要历史价值。首先对研究这些族氏或方国的历史,包括迁徙和融合史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有的族氏铭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如罗山蟒张的“息”铭,为研究族氏史增添了新资料。而石楼义牒的“𠂔”铭,字的结构像一颈上带刑枷的人,被囚在牢房内。这与1969年山西侯马发现的战国殉葬墓,殉葬人的颈上还有铁颈锁,正可互补,对研究殷商刑法和政治具有一定价值。

商代铜器上有的族氏名是合体字,如:1966年山东益都苏阜屯出土的青铜大钺有“酓亚”铭族徽,安阳殷墟五号墓出有“亚其”、“亚启”铭族徽。对具有“亚”铭的族氏的解释,不同的说法很多,但从铜器铭文和《尚书》记载的“大亚”、“多亚”等看,有学者提出具有“亚”铭族徽的物主人应是外服诸侯,还是较为合理的。新发现的“酓亚”、“亚其”等铭文铜器,无疑可以进一步提高传世铜器中同铭器物的科学价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商铜器简略铭文中,不少都标明了为祭祀祖、妣、父、母、兄而作器。1976年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了“司母辛”、“司

①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2期。

② 杨宝顺:《温县出土的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2期。

③ 《定州市发现大型商代方国墓葬》,《光明日报》1991年11月28日1版。

④ 石楼县人民文化馆:《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72年4期。

⑤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

⑥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

母癸”铭铜器，尤其是“司母辛”铭的发现，为深入研究闻名于世的司母戊鼎的年代提供了新的依据。从“司母戊”铭书体与“司母辛”铭书体等方面相比较看，司母戊鼎的年代可以提前到殷墟第二期武丁至祖庚、祖甲时期^①，提前了几个王世。

众所周知，殷商后期铭文在二三十字以上的铜器极少见，其中主要有：今藏美国旧金山博物馆的小臣隰犀尊，铭文 27 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霁卣盖、器，铭文 47 字；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絺簋，铭文 36 字。商代后期铜器长铭内容除表现祭祀之外，还有赏赐、征伐、宴飨、狩猎等多方面内容。令人欣喜的是，陆续出土和发现了有较长铭文的殷商后期铜器，如 1959 年河南安阳后岗出土的戌嗣子鼎^②，铭文 3 行 30 字：“丙午，王赏戌嗣子贝廿朋，在囿宗，用作父癸宝鬯。隹王囿囿大室。在九月。犬鱼。”铭文中的“鬯”字，从“匕”看，表明鼎、匕相配。《说文解字·匕部》：“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鼎匕相配，表明饭应包括素食与肉食两大类。值得指出的是，台湾古越阁收藏的一件商代直内戈的内部铸一族徽，其形象是在一鼎上站立一人，推测鼎上之人形，可能是古代叉取食物用的“匕”的另一种写法，这是在金文中“人”与“匕”通用的实例。至于戌嗣子鼎铭末的“犬鱼”二字，应为一种复合族氏铭。铭文整体内容是商王在囿地大室对戌嗣子赏赐贝廿朋。

1982 年山西汾河下游的曲村商周文化遗址 81 号西周早期墓出土一件方形有铭鼎（图一），鼎内腹壁铸铭 26 字，内容是器主甯孚得到商王赏赐后，作纪念父辛和祖甲的祭器。从铭文推测，器主甯孚是商王同宗族人，祭祀的是商王武乙和廩辛，铭文所记“唯王廿祀”就是商王武乙二十年，因而该器应是武乙时代的。商王室器物之所以能到周人手里，应与西周灭商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有关。

① 杜迺松：《司母戊鼎年代问题新探》，《文史哲》1980 年 1 期。

②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 年 1 期。



图一 商后期 鬯竈方鼎与铭文

值得重视的是，山东省菏泽市文化馆在 1952 年收集到一件商代宰甫卣，实为以往著录过的宰甫簋^①。该卣器与盖对铭。3 行 23 字：“王来兽（狩），自豆录（麓），在禘腍。王飧酒。王光（赐）宰甫贝五朋。用作宝鬯。”铭文内容同时反映了三件事，即狩猎、宴飧和赏赐，这在商铭中很难见到。

近年新出殷商后期青铜器铭文，对深入研究商代家族史、方国史、祭祀制度、思想意识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史料。

二

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西周时期比商代更有过之。贵族的重要事件“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②，《礼记·祭统》亦云：“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① 菏泽市文化馆：《殷代长铭铜器宰甫卣的再发现》，《文物》1986 年 4 期。

② 《墨子·非命》。

以祀其先祖者也。”《墨子·鲁问》：“攻其邻国，杀其民人……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从文献记载看，贵族在铜器上铸刻铭文，总的目的是称颂先祖的功德。先秦铜器铭文中，以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最多，上百字的长篇亦多，早就受到了金石学家的重视。近五十年来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许多都有铭文，铭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是研究西周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

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的宜侯矢簋，铸铭126字，其铭有：

王命虞侯矢曰：□侯于宜。……易土，畋川百□……易在宜王人十又七生（姓）。易奠七白，畋夫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

这是康王改封虞侯矢为宜侯，并赐器物、土地、山川和奴隶的记载。周王赏赐宜侯矢的农业奴隶“千又五十夫”的这一数字，恰与清道光年间陕西眉县出土的大盂鼎铭所记康王对贵族孟赏赐奴隶数目相同。1964年北京房山琉璃河M52出土的复尊铭文有“匱（燕）侯赏赐复冕衣、臣妾、贝”^①内容，所记“臣妾”即男女奴隶之名称。“臣妾”同赐，在铜器铭文中还是少见的。而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几父壶铭记几父受到上司同仲“仆四家”的赏赐^②。1980年山东滕县后荆沟出土的西周不娶簋铭文151字，铭文内容表明器主因征战有功，受到周王的嘉奖，其中包括“臣五家”的赏赐^③。上述赏赐的奴隶是以家为单位。这一家包括多少人，还需新的资料来证明。

以上所举的“臣”、“妾”、“仆”等都是奴隶名称。《周礼·地官》：“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佞者，质剂焉。”反映了奴隶制度的残酷性。近年新出有关奴隶被赏赐的铭文，可与文献和传世品的铜器铭文相互补证。

①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5期。

②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③ 万树瀛：《滕县后荆沟出土不娶簋等青铜器群》，《文物》1981年9期。

新出铜器铭文中，有不少反映西周土地制度方面的内容。

西周社会土地属于天子一人所有，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可以把土地赏赐给诸侯和臣下，让其世代享用，但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并要定期交纳贡赋，周王还可随时收回土地。新发现的铜器铭文，不少都记载了赏赐田地事，如19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成王时的旃鼎铭有“王姜易旃田三于待劓”^①（图二）。“田三”即三田，一田等于一百亩，三田即三百亩。王姜不但赏赐给旃三百亩



图二 西周初期
旃鼎铭文

① 史言：《眉县杨家村大鼎》，《文物》1972年7期。

田，而且还包括了田内即将成熟的禾稼。1969年陕西蓝田出土西周共王时期的永盂，铭文12行，123字^①。铭文记周王赏赐大臣师永田地事，“赐矢师永毕田阴阳洛疆累师俗父田”。而赏赐师永田时，则是由益公带领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等大臣来完成王命的。由此不难看到，周王朝对赏赐国有土地的重视。山东滕县后荆沟不窋簋铭，记周王赏赐不窋“田十田”。江苏丹徒烟墩山宜侯矢簋铭记周王赏赐矢“田川”和“宅邑”。这些铭文资料，对研究西周时代国有土地占有形态极其重要。

众所周知，在传世的一些西周有铭铜器中，如格伯簋、散氏盘、鬲从盨等，反映了西周中期以后私人土地的占有，冲破了国有土地的禁锢，奴隶制在逐渐走向衰落。新出铜器铭文，增添了这一方面的新资料。最重要的是，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几件西周中期卫器铭文^②，其中包括卫鼎甲铭文207字，卫鼎乙铭文195字，卫盂铭文132字。卫盂铭中记载了矩伯庶人从裘卫处索要了朝见周天子的玉璋，其价值为八十朋贝，而矩伯庶人给了裘卫一千亩的土地作为玉璋的代价。即铭文所记的“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才八十朋毕貯，其舍田十田”。卫鼎记执政大臣同意邦君厉租给裘卫四百亩田，并让官员踏勘租田的四界。从铭文内容可知，有关双方在换取田地时，要向宫廷执政大臣报告，同意后才能成交。这说明虽然土地私人占有已经出现，但在名义上土地还是国有的，因此在形式上还要得到宫廷的同意。卫器等铭文说明在西周中期以后，土地制度已经开始变化，在奴隶制社会内部开始出现封建制的萌芽，这对研究奴隶制社会经济和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极其重要。

战争是西周国家的重要大事，鉴定中所见新出铜器铭文中不少都反映了这一内容。1976年陕西临潼县西段窖藏出土的利簋（图三），铭文32字，内容简朴，开首有“珅征商”三字，明确记载着西周武王征伐商纣之史事。重

① 唐兰：《永盂铭文解释》，《文物》1972年1期。

② 庞怀清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5期。



图三 西周初期 利簋与铭文

要的是，铭文中所记伐商时间是在“甲子朝”，这与《逸周书·世俘解》“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所记伐商时辰完全吻合，证明古籍记载正确可信。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共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前段在歌颂西周王朝已故的文、武、成、康、昭、穆和当朝的共王各王时，其中对昭王的颂辞是：“弘鲁昭王，广批楚荆，唯狩南行。”^①明确记载了周昭王一生的重要功绩是伐楚荆，这与史书所记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两次大规模伐楚是相吻合的。昭王十九年伐楚还死在了汉水中。史墙盘铭的记载解决了学者间长期以来对伐楚荆是成王抑或是昭王的争论。

传世铜器铭文许多都反映了西周国家征伐西北强族獯豸的战事，典型的

^①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1期。

如康王时的小孟鼎、孝王时的虢季子白盘。1980年陕西长安县下泉村发现的多友鼎，内壁铸铭275字^①。鼎铭记周厉王时玁狁侵犯京师，以及荀等地，厉王委派武公部下多友与进犯者多次进行战斗，结果多友所率部队杀死敌人“二百又五人”、“三十又六人”、“百又十又五人”，计三百五十余人。俘获敌人“执讯廿又三人”、“执讯二人”，并缴获敌人大量兵车与物品，仅在鄠地就“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由此可见战争激烈之程度。

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西周穆王时期的Ⅱ式戎鼎，内壁铭文115字，Ⅰ式戎簋盖器对铭，铭文134字^②。戎鼎铭文记载了戎征伐淮戎事，铭云：“周天子，肇使乃子戎，率虎臣御淮戎。”戎簋铭文记“戎伐鬲”地，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获馘百，执讯二夫”，等等。

新出土西周铜器铭文有关战争与征伐的记载，是研究奴隶制国家军事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财富与奴隶。

新出土西周金文有的反映当时贵族的有关礼仪，这与文献记载的西周礼仪制度多，而且相当完善是一致的。1954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普渡村发现的穆王时的长由盃铭：“穆王在下泂应，穆王飧醴，即井伯大祝射。”^③铭文中的穆王属生称。铭文记载穆王在下泂行屋行飧射之礼。在反映礼仪制度上更富特点的铭文是，1955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盥驹尊铭文，记载了执驹之礼，“王初执驹于欣……王亲旨盥驹，易两”。这里周王亲自参加幼驹长大脱离母马，正式作为畜力使用时所进行的“执驹之礼”。从中也反映了周王朝对马政的重视。盥驹尊铭内容可与《周礼·夏官·校人》等有关执驹之礼相互补充。

何尊铭文与传世重器大孟鼎铭文内容性质相同，同属训诰一类。所谓训诰，即天子对臣下的某种命令或告诫。从文献和铜器铭文看，西周时代，训诰时一般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因而也就成为某种礼仪。何尊铭文是周成王

① 田醒农、雒忠如：《多友鼎的发现及其铭文试释》，《人文杂志》1981年4期。

② 罗西章、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戎诸器》，《文物》1976年6期。

③ 郭沫若：《长由盃铭释文》，《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